

大易视角下的“中和”翻译批评标准研究

陈东成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周易》是大道之源,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文章援易入译,提出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论述了其重要特性——整体性、多元性和动态性,并探寻了翻译批评“致中和”的“三多”方法。这为研究翻译批评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进一步从大易的视角研究翻译批评的相关问题做了一定的铺垫。

关键词:中和;翻译批评标准;大易;《周易》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5-0148-07

“大凡一件事,有人开始做,就有人开始评。有文学创作发生,于是有文学批评;有翻译活动发生,翻译批评随之而来。”^[1]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一种实证性的知性审美认知活动,是批评者根据一定的批评标准和原则,采用相关方法,对翻译现象和结果(包括译作和译论)进行分析和评价。翻译批评对促进翻译事业发展和跨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批评免不了要作判断,要作判断就得有个标准。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翻译批评离不开批评标准。“标准问题是一切批评的中心问题。”^[2]翻译批评标准问题自然是翻译批评的中心问题。所谓翻译批评标准,顾名思义,是批评者在翻译批评活动中所遵循的准则。与翻译标准一样,翻译批评标准多种多样,本文拟从大易的视角探讨“中和”翻译批评标准。所谓“大易”,即指《周易》以及推演这部经典的观点和学说。本文中的“大易”主要指《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含六十四卦卦符和经文;《易传》由《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七种十篇组成。有时人们用《易经》代指《周易》^[3]。

一、“中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哲学依据

《周易》尚中。六十四卦中,“中”指一卦的第二、五爻的爻位。第二爻为下卦之“中”,第五爻为上卦之“中”,象征事物守持中道,行为不偏。易学的中道思想,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最早的源头之一,就是通过这两个爻位体现出来的。在一个卦章中,六二爻和九五爻同时出现,便是“中正”,这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征兆,同人卦和观卦就是如此。《同人·彖传》说:“‘同人’,柔得位得中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4]《观·彖传》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

当代美国著名易学家成中英根据《周易》中“中正”、“当位”、“应”、“失位”、“不当位”、“失中”(“不中”)、“敌应”等结构,将“中”的概念扩大,认为“中”就是阴阳与位的适当结构,而这种结构会在适当的关系中发展至其他的结构。这意味着“中”一方面是一个和谐、秩序、融贯、协调的结构,一方面也是一个

收稿日期:2016-04-06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重点科研项目“大易视角下的翻译美学研究”(GK201601)

作者简介:陈东成,深圳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大易翻译学研究。

产生更多和谐、秩序、融贯、协调,或至少是维持及继续此种融贯、协调之历程^④。

“和”的概念在《周易》中极为深厚。《易传》中的《乾·彖传》就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天道变化,万物各自禀受其性,得天赋之命,而太和元气得以保全、融合,这样就使得物性和谐,各有其利,万物都能正固持久地成长^⑤。“和”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阴阳观念是《周易》的灵魂,泰、否、既济、未济等卦都以对比的方式,形象地表明了阴阳相交而达到和谐的思想。《周易》“和”的美好境界,还诗意般地体现在一些爻辞中,如《中孚·九二》展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山清水秀,鹤鸣子应,一幅和泰、和谐的自然图景;笙歌美酒,贤主嘉宾,一片和睦、和悦的人伦之情。

“和”的思想在诸子中获得认同。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管子说:“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管子·禁藏篇》)王充主张“天地合气,万物自生”,“阴阳和,则万物育”(《论衡·自然》)。董仲舒也十分推崇“和”的思想,他认为:“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天地之道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和”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是儒家文化中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中和”是“中”与“和”的结合。“中”与“和”的关系可以说是体用关系或因果关系,事物因“中”而“和”,“中”是体,是“和”的前提,“和”是用,是“中”的结果。不同事物相处一起,要保持一种均衡稳定状态,必须彼此协调一致,和谐共存。“和”的本身就是追求一种恰当有序的和谐状态,任何偏激、失衡、失度、失序的错误倾向,都是与和谐不相容的,而事物之间的和谐,绝不是一时东扯西拉、胡乱拼凑在一起,而要按各自的客观规律让其自然发展。“和”必须以“中”为度,各种因素必须公平、公正、合理,相协互补,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和”^⑥(P7)。中和思想贯穿《周易》全书,书中的卦象、卦辞、爻辞、系辞等都体现了中和思想。

“中和”思想在儒家著作中,逐步演进,次第完成。孔子讲“中庸”、“中行”,孟子讲“中道”,而荀子第

一次提出“中和”一词,他说:“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荀子·王制》)“衡”是衡量轻重的“秤”,“绳”是辨别曲直长短的准绳或标准,故“衡”与“绳”都是代表公平准则的中和之道,都是指合理的评判是非的标准^⑦(P310)。

根据以上对“中”、“和”以及“中和”的分析,笔者认为,翻译批评应以“中和”为旨归,“中和”可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

二、“中和”翻译批评标准的特性

“中和”以适中和协调为内在精神,形成一种普遍和谐的关系体系。以“中和”为理论依据而建立的翻译批评标准就形成一个和谐的翻译批评综合体系,呈现多种特性。本文着重探讨其整体性、多元性和动态性。

(一)整体性

《周易》卦爻是一个整体,八卦、六十四卦为二级全息系统。八卦由阴、阳爻三重构成,六十四卦由八个单卦推演而成。后者六个爻位上二爻为天道,下二爻为地道,中二爻为人道,天、地、人三才融为一体。六十四卦模式以“六爻”、“六位”关系为基础,以时、位、中、比、应、乘等为原则和标准,给人们提供一个从时间、空间、条件、关系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⑧。这种思维方法不仅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认为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而且把每个事物又各自视为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⑨。这种思维方法显然体现了中和思想的整体性。

翻译批评应该将局部的、微观的批评与整体的、宏观的评价有机结合。评价一篇译文或译论,总有所侧重,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不管是对翻译的专题评价,还是局部的批评,都不能忽视对整体的把握,不能忽视对相关影响因素的考虑。为此,杨晓荣提出了一个“翻译相关因素及制约作用分析模式”,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基于翻译过程的综合性翻译批评模式,并用图示作了说明^⑩(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从略)。我们可以从杨晓荣的综合性翻译批评模式得到启示:翻译受诸多因素的制约,翻译批评时应应对相关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明确各因素间的联系与制约关系,强调翻译批评的整体性。

张岱年、成中英等著的《中国思维偏向》说：中国传统哲学，不论儒家或道家，都强调整体观点。整体是一个近代的名词，在古代称之为“一体”或“统体”。所谓整体观点，就是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易传》强调“观其会通”，即观察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10](P120-121)

“任何事物都不能独成其美，事物只有在整体中显现其美。”^[11]翻译批评也不例外。在翻译批评中，我们不能仅凭感觉行事，忽视局部的、具体的翻译转换活动。翻译批评者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注意局部与整体的有机统一。

(二) 多元性

《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史伯论和同的一段话：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从中可以看出，只有多种多样不同的事物协调和合，才能产生新事物并且具有无限生命力，从而得到兴盛和发展。这就是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也就是说，事物只有达到多样性并存的中和状态，才有可能显现出多彩多姿^[9](P10-11)。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和”是异类相承的结果，表示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多层阴阳关系的和谐统一。

王夫之认为：“物物有阴阳，事亦如之。”(《张子正蒙注》卷一)正所谓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事事一太极，每一种存在、每一种过程都是一个阴阳和合的太极建构。而每一太极建构自身也是多元、多层面的，其间各组成部分共依并存，相互联系。可谓阴阳中藏阴阳，阴阳之外有阴阳。《中庸》第三十章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说明系统的不同部分，母系统和子系统各自释放自身的能量，发挥自身的作用^[12]。

世界是一个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文化是一个系统，翻译批评也是一个系统，他们分别实现自己的太极建构。就翻译批评而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

文字批评，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所谓文化批评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把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个子系统来理解，在文化整体系统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功能，研究其在文化系统中的受制性、独立性和超越性，研究其与文化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渗透与分离、交融与转化等^[13]。“所谓翻译的文化批评就是要求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建立多元的批评标准体系，突出批评标准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注重翻译的文化背景及相关因素。”^[14](P24-25)

王宏印在《英汉翻译综合教程》中指出：

“翻译”这个术语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整个翻译活动可以按照翻译所涉语言、活动方式、文体特点和处理方法分为若干类型，每一类型又包括若干具体的小类。因此，就整体而言，翻译又是一种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活动系统。^[15]

既然翻译是一种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活动系统，而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及其社会效果的评价，它自然是一种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活动系统。翻译离不开多元文化语境，而“多元文化语境要求对事物的判断采取多元价值取向”，翻译批评“应当是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对待译作、译者得出的概念和结论也不应当是唯一的”^[14](P181)。一条死板的翻译批评标准不能作为衡量所有译作或译论的尺度。在翻译批评中，不可能有唯一的客观标准。从解释学角度看，因语言具有流变性，其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翻译的目的、材料、策略等的不同，具体的翻译批评标准也会是多元的。现以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为例略加说明。科学翻译是以传递科学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是译者用译语表达源语科学信息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因此，科学翻译批评，除了忠实、通顺外，应特别强调明晰、准确，因为知识的传播和科学的普及不允许丝毫的含糊和错漏。这里的明晰、准确主要就原文信息而言，而具体措辞，只要不歪曲原文的意思，可不必细究。文学翻译是把原文学作品中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像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翻译过程中追求语言的艺术美、再现原作的艺术性是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主要任务。相对于科学语言，文学语言生动得多，繁杂得多，可变因素也多得多。显然，用科学翻译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翻译是不够的。文学作品的丰富多彩决定了翻译批评标准的多元性。例如，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译文生动形象、形神毕肖、雅俗等同、简洁精美、词情并茂^[16]。而在翻译实验性、探索性的文学作品时，最要讲究的

是忠实^[17]。同是小说,科幻小说和一般严肃文学的翻译标准也有所区别^[18]。诗歌翻译在文学翻译中最难,要求最高,因其具有独特的音韵、格律、语气、意象、意境、修辞等,如何外化为译文,绝不是忠实、通顺所能包含的^[14](P138)。王宏印从六个方面提出了一套以诗歌翻译为模式的文学翻译评判标准,可供我们借鉴:(1) 译文体制是否与原文体制相一致而且合适;(2) 译文是否像原诗一样具有诗味而且有可读性;(3) 译文是否具有译入语应当具有的文学语言特色;(4) 译文是否体现译入语(或译出语)的文化特色而且和谐;(5) 译文在思想内容上是否符合原作的创作倾向;(6) 译文的表现风格是否与原作属于同一类型^[19]。

(三) 动态性

《易传》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的发展过程,而“物不可以终通”(《序卦传》),必然再次转化为穷。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自然法则:物穷必变,变则通,通久必穷,穷而后变。这一法则说明“中和”仅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阶段或说一种状态,当然是事物发展最顺畅、最和谐、最美善的阶段或状态。这种阶段或状态不会恒定不变,和久必变是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20]。因此,《易传》提出“与时偕行”、“时行”的观点。例如: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文言传》)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象传》)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象传》)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文言传》)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贞。(《大有·象传》)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象传》)

“道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21]李鼎祚《周易集解》说:“天道有昼夜日月之变,地道有刚柔燥湿之变,人道有行止动静吉凶善恶之变。”^[22]“道有变动。”(《系辞下传》)道具有“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系辞下传》)的特点,即道具有运动变化的特点,在天地四方流动,时上时下,没有定止,时刚时柔,互相转换。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规则能通古今的,也没有一种教化是屡试不爽的;即使有也一定会被今后的时代所代替,绝对没有永远存在的道理。所以,任何标准都不能当成教条,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就是《系辞下传》所说的“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中和”翻译批评标准是一个开放性的而不

是封闭性的系统,它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动态调整。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翻译批评标准。个中原因非常复杂,这里仅谈两点:

1. 翻译活动的历史性

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翻译活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规律就有新的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如中国当今改革开放时期与清末民初时期,人们对翻译的本质以及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等就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的变化要求翻译批评标准作动态调整,翻译批评标准因此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诚如刘宓庆在《现代翻译理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80多年来,我国译坛虽然大体仍以“信达雅”为译事楷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三难”之说的内涵迭变,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之不同而演进变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流变不定、莫衷一是的权宜之议,也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等看成一成不变、恒定守常的条条框框。^[23]刘宓庆的见解符合“中和”的动态观,说明了翻译批评标准具有相对性、非恒定性的特点。

2. 批评者的主体性

翻译批评是由批评者作出的,而批评者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于,自我赋予对象以意义、自我解释对象、自我统一对象、自我构成对象,即主体决定客体,意识决定对象^[24]。正如不同的人看《周易》,会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算卦者从中看到卜筮,哲学家从中看到哲理,史学家从中看到历史,科学家从中看到科技,政治家从中看到治世,军事家从中看到用兵……

批评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有着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从历时的角度看,每个批评者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时刻经历着变化。批评者的期待视野、审美经验、思想观念等是历史形成的,并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在发展,人类的知识在不断丰富,批评者的认知环境、审美能力、接受心理、价值取向等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因此,对同一译作或译论的评判就会出现历时性的差异。从共时的角度看,同一时代的批评者,由于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审美情趣、文化立场等的差异,也存在使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评判同一译作或译论的情况。客观上,同一时代不同的批评者总是从自己的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作或译论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见仁见智”,在翻译批

评中讲的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进入21世纪后,翻译需求甚殷,翻译作为一种产业进入专业化时代,翻译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对翻译的需求也朝着多元化发展。所以,翻译批评也应与时俱进,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客观地评价现实社会中多样化的翻译活动^[25]。

三、翻译批评“致中和”的方法

“中和”标准为翻译批评要达到的目标树了一个杆。怎样“致中和”,翻译批评方法尤为重要。翻译批评方法,“就是翻译批评者认识、理解和沟通对翻译活动看法的各种途径、媒介、方式的总和”^[26](P168)。翻译批评方法多种多样,不胜枚举。笔者拟从“三多”——多层次、多视角和多途径进行讨论。

(一)多层次

《系辞上传》开篇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地并非处同一位置,有高低之分;事物并非属同一层次,有贵贱之分。《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由初、二、三、四、五、上六爻构成,初、二爻代表地,三、四爻代表人,五、上爻代表天,地、人、天一体,但所处不同位置,分属三大层次。“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上传》)天下各种意识观念以门类相聚合,各种动植物以群体相区分。万事万物各有所归,处于不同位置,属于不同层次。

由上述易理推及翻译批评方法,翻译批评方法无疑有层次性。所以,翻译批评不能局限于同一层次,而应在多层次上进行。杨晓荣在《对翻译评论的评论》中提出“表层批评”(技巧性批评)和“深层批评”(理论性批评)概念,并对这两种批评,特别是深层批评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27]。温秀颖等将翻译批评方法分为哲学层次、逻辑学层次和具体学科层次进行阐述,这对翻译批评者有一定借鉴作用^[28]。吕俊、侯向群在《翻译批评引论》中说的下面一段话很有见地:

翻译批评学摆脱了翻译批评那种以特定文本或现象为评价对象的具体层面,就可以把原来无法进行比较的翻译活动放在一起比较了。如原来我们无法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同一本文学名著的翻译放在一起进行评论,甚至认为这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荒唐的。但是如果把两者均放在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大

目标下来看,它们的社会价值就显而易见了,一个是改造社会并带来人类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强大思想武器,而另一个给人们带来的仅是满足审美需要的愉悦感。若从审美需要的满足上来看,前者又无法同后者相比。但是在评价活动中,在不同类型的价值的选择上是有一定的等级序列的,在这里,重大的社会进步价值当然远高于审美价值。^[29]

(二)多视角

站在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事物,结果可能不一样,甚至有很大差异。这就像不同的观察者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一座建筑物一样,他们观看的虽是同一座建筑物,但看到的却是这座建筑物不同侧面所展示的面貌。翻译批评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译作或译论,可能有不同的印象和感受,从而作出不同的评价。从价值判断而言,批评者可以从真理价值、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功利价值等不同方面切入。这里以林纾的翻译实践活动为例作简要说明。林纾早期的翻译活动以道德价值为主要价值取向,如翻译《黑奴吁天录》,主要是揭露西方殖民者对黑奴的虐待与欺压,让国人通过了解黑奴的悲惨命运而间接了解华人在美的境况,呼唤民族觉醒与自强,让国人在哀黑种将亡的同时哀黄种之将亡,因为他的目的主要在宣教启蒙。而林纾的后期翻译活动以审美价值为主要价值取向,所以他后期翻译的作品多为文字华美的艺术性强的文学作品,如《吟边燕语》等作品,这是因为他认为“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译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30]所以,对林纾翻译活动的价值评价,视角不同,结论就会不一样。

(三)多途径

《系辞下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道路走到同一个归宿。翻译批评可采取多途径进行。许钧在《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中将通常使用的翻译批评方法归纳为六类:(1)逻辑验证的方法;(2)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3)语义分析的方法;(4)抽样分析的方法;(5)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6)佳译欣赏的方法^[31]。王宏印在《文学翻译批判论稿》中列举并阐释了十项翻译批评的基本方法:(1)细读法;(2)取样法;(3)比较法;(4)逻辑法;(5)量化法;(6)阐释法;(7)互文法;(8)历史法;(9)模型法;(10)评价法^[32](P93-105)。温秀颖在《翻译批

评——从理论到实践》中较详细地讨论了翻译批评方法,将其分为四大类:(1)文本途径的批评方法,包括传统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解构主义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语言学批评方法;(2)译者途径的批评方法,包括道德批评方法、目的论批评方法;(3)读者途径的批评方法,主要是接受批评方法;(4)综合的批评方法,包括心理学批评方法、科学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文化学批评方法^[20](P182-207)。具体的翻译批评中,究竟使用何种方法,无一定成规,均视特定对象、适应范围等具体情况而定,批评者应当坚持客观、公允、合理和科学的标准,择其宜者而用之。

翻译批评方法多种多样,可谓琳琅满目。所以我们所说的“三多”中的“三”可理解为“多”,我们还可以说“多维度”、“多侧面”、“多学科”等。翻译批评方法在总体上呈现开放性系统的特性,不能只从一个方向、一个平面、一条直线上去研究。我们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等进行相关研究。但无论方法怎样,翻译批评应不断朝着“中和”这一目标努力。

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学科建设、翻译人才培养等都需要翻译批评,所以季羨林呼吁:“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现在批评很少,担负不起应有的职责来。这方面,必须大力加强才行。翻译的批评十分重要……所以,我呼吁,现在要加强翻译批评,发挥批评应有的作用。”^[21]然而,翻译批评不是盲目进行的,得有正确的标准。本文提出的“中和”翻译批评标准,以易理为理论依据,呈整体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性,能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具有较大的哲理性和现实意义,相信会对翻译事业有所裨益。

注:

- ① 本文所引《周易》原文出自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文内注只标注所属经、传,其它信息不一一注明。所引其他古籍原文的文内注一般也只标注书名和篇名。

参考文献:

- [1] 王克非.关于翻译批评的思考——兼谈《文学翻译批评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3).
[2] 黄书泉.文学批评新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36.

- [3] 陈东成.大易翻译学初探[J].周易研究,2015,(2).
[4] 成中英.易学本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9-190.
[5] 陈东成.翻译审美的大易视角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4,(1).
[6] 程静宇.中国传统中和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 张其成.易道主干[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291.
[8] 杨鸿儒.换个角度读《易经》[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391.
[9] 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186-190.
[10]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20-121.
[11] (美)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博凡译.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3.19.
[12] 李树尔.周易诗解及卦体二进制转换[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6-8.
[13] 黎跃进.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8-19.
[14] 肖维青.翻译批评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15] 王宏印.英汉翻译综合教程[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
[16]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254.
[17] 余中先.译介先锋文学必须忠实[N].文汇报,2000-12-7.
[18] 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149.
[19] 王宏印.参古定法,望今制奇——探寻文学翻译批评的评判标准[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3).
[20] 陈恩林.论《易传》的和合思想[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
[21] 易正天.易经的智慧阅读[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118.
[22] 阿鸿.易经的至理名言[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183.
[23]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64.
[24] 铁省林.西方哲学主体性问题的历史嬗变[J].齐鲁学刊,2003,(2).
[25] 龙明慧.翻译原型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153.
[26] 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27] 杨晓荣.对翻译评论的评论[J].中国翻译,1993,(2).
[28] 温秀颖等.英汉翻译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211-213.
[29] 吕俊,侯向群.翻译批评学引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19-20.
[30] 林纾.吟边燕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

[31]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增订版)[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37-39.

【责任编辑:向博】

[32] 许钧.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396.

A Study of the “Mean and Harmony”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Yi

CHEN Dong-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e *Zhou Yi* or *Book of Changes*, teeming with philosophical wisdom, is the founta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me of its principles can be applied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the relevant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the *Zhou Yi*,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mean and harmony”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expound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diversity and dynamicness, and proposes various methods to fulfill the criterion. The paper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studies of the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Yi.

Key words: mean and harmony;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Great Yi; *Zhou Yi*

~~~~~  
【上接第 41 页】

## Contex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Idea

WANG Lin-sheng

(Cultural Institute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nternet Plus” is a new concept that ushers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Internet-oriented network orde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culture, “Industrial Internet” put forward by the US and German “Industry 4.0” both focus on technology reform, and relate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Internet. “Internet Plus” concept advocated in China focuses on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new forms of economy. Its practice is set in a complicated context with three overlapping periods: the “seizing high points period” brought by a new 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form,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period”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s, and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period” of emerging Internet industry. The differ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 indicates the “Internet Plus”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 both have extensiv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Theoretically, “Internet Plus” re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ent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shows Internet has become a basic productive force for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ally, “Internet Plus” represent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life style, production method and public service at a new stage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context; practice; connotation